

關於古城貞吉的《滬上銷夏錄》

沈 國威

中國翻譯日文資料始于何時？康有為曾編纂《日本書目志》（1898），收入日本各種圖書7000餘種。但是《日本書目志》所根據的是日本書肆的圖書目錄，康有為實際購入，並閱讀過的日本書數量不多。^[1]儘管先覺者已經認識到日文圖書的價值，但是由於，一，圖書購買困難，二，日語人才不足，致使擬議中的翻譯計劃無法實現。筆者認為日文圖書資料的真正翻譯開始於《時務報》的“東文報譯”。

汪康年1896年創辦旬刊《時務報》，“廣譯五洲近事”是其主要內容之一，為了使國人“知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苟至夜郎自大，坐井以議天地”。汪康年認為“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彼己之郵”。《時務報》在籌備階段汪即委託妻弟查雙綬在日本物色日文翻譯人員，最後選定日本熊本人，漢學家古城貞吉（字坦堂）擔當譯事。^[2]《時務報》從第3冊（1896.8.29）起開始登載“東文報譯”欄，至1898年8月8日第69冊止，共刊登59回。總翻譯量超過40萬字，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從目前的情況看，“東文報譯”欄均為古城所譯。



日本漢學家 古城貞吉

那麼，古城是在哪裡翻譯的“東文報譯”呢？關於這段歷史，一般的說法是，古城接受委託後，在東京購買各類報紙刊物，譯好後用班船寄給上海。例如，閻小波指出：“譯報大多由報館所顧的譯員從訂閱的外報上譯出，其中日文部分由古城貞吉譯好寄來。”（68頁）

研究者多採用此說，或對“東文報譯”的翻譯地點未加特別注意。但是從文化交流，語言翻譯的角度看，在何地翻譯則不是一個可以等閒視之的問題。因為，若是在上海翻譯，《時務報》方面可以對翻譯內容，使用詞彙等提出具體的，及時的要求。

關於“東文報譯”的翻譯地問題，由於當事人古城貞吉本人對其上海之行，尤其是在上海

參與《時務報》的活動終生諱莫如深，所以考證古城的行蹤只能通過所謂“周邊證據”。筆者曾通過分析古城給汪康年的信函，得出結論：從 1896 年夏天到 1897 年底的大部分時間，古城在上海逗留，從事“東文報譯”的翻譯工作。所謂“古城貞吉譯好（從日本）寄來”是 1898 年以後的事。《汪康年師友書札》（以下略為《書札》）中共收錄古城致汪的信函 16 封，起於 1897 年 1 月 24 日，止於 1899 年 12 月 27 日。具體時間等如下：

第 1 函	1897.1.24	第 9 函	1898.8.25 (到)
第 2 函	1898.2.17 (到)	第 10 函	1898.10.2
第 3 函	1898.4.9	第 11 函	1898.10.12
第 4 函	1898.4.27	第 12 函	1898.8.29
第 5 函	1898.5.16	第 13 函	1898.12.12
第 6 函	1898.6.4	第 14 函	1899.1.24
第 7 函	1898.6.27	第 15 函	1899.8.21
第 8 函	1898.8.15	第 16 函	1899.12.9

第一封信的內容為：

辱芳書，拜展三復，感厚意，萬謝萬謝。弟滬上分袖後，布帆安穩抵長崎埠。一入故鄉熊本，居兩日欲上東京，途至神戶客舍，獲寒熱，淹留者數日矣。會有京友來訪者，乃托辦事而復旋故鄉。（中略）數日後必啟行上途，意者貴曆元日抵滬上也。若不能，然則八日必抵滬也。代購各種書籍亦攜至，若不能悉攜，則應為郵送至滬之計，伏請勿費神。敝國近時有喪，皇太后朝望頗靜肅，東京政情亦為此無可觀焉。弟所以欲抵京而不遂抵，蓋亦為此也，不啻為獲疾也。書餘萬端，言短意長，伏惟嚴寒珍重。弟貞吉頓首。
日曆一月廿四日。（《書札》3306 頁）

日本英照皇太后的逝世是 1897 年 1 月 11 日，因此這封信的日期可以確定為 1897 年。^[3]從信的內容可知古城剛剛從上海返回長崎，便接到了汪康年催他儘快去上海的信。古城在回信中答應在中國的春節（1898.2.2）前後返回上海。返回上海的目的不言而喻的，即擔當《時務報》東文報譯的翻譯。

《書札》所收古城致汪康年的第二封信，由日本寄出，到達日期為 1898 年 2 月 17 日。第一封和第二封信間隔一年有餘。為甚麼會有這麼長時間的間隔？合理的解釋就是：這期間古城人在上海，無須給汪康年寫信。也就是說，古城 1897 年 1 月返回上海後，到 1897 年 2 月之前的一段時間裡，一直在上海居留。那麼，古城是甚麼時間離開上海的呢？應該是 1897 年的年底。汪康年於 1897 年冬赴日本考察了一個多月，古城有可能是在這時陪同汪回國的。回國後的古城忙於各種事務，“東文報譯”的譯稿也就發生了遲延。收入《書札》中的古城的第二封信就是答應儘快將譯稿寄到上海的內容，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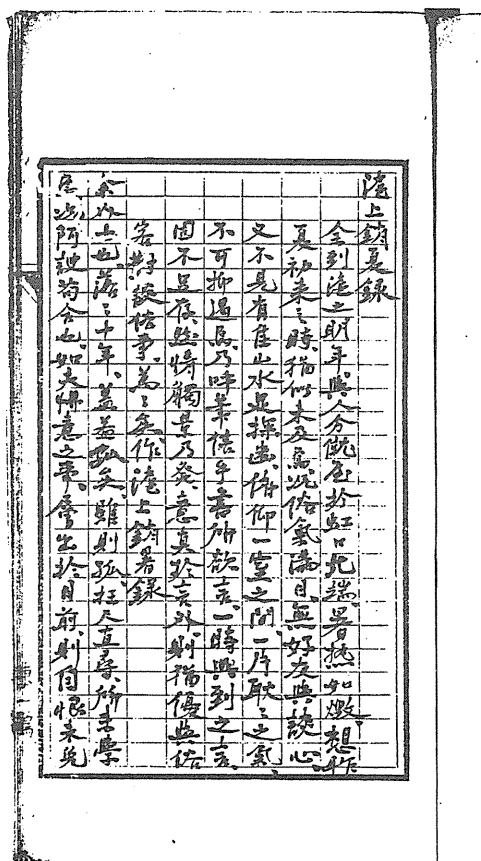
農，蒙兩館各位先生萬福，請傳語兩館，譯稿之件，亦必不遺忘也。為事多，故遲遲至今，頃日俗事稍就簡，當專心於譯著，次期輪船開行之便，必奉上數頁無誤也。仲閣先生大人閣下。弟貞吉又白。（元月廿七到）（《書札》3307頁）

但是，在此之前《時務報》第 50 冊卷末曾刊登告白稱：“本館告白 本館之東文譯編今年係請古城坦堂貞吉在家譯寄此次因譯稿未寄到故暫停行印其俄文譯編係承上海李蘭舟先生家鑿由海參崴寄來故即列入報內合并聲明（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898.1.3）”。但實際上，“東文報譯”是從 51 冊（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廿一日，1898.2.11）開始脫期的（51，52 連續兩冊暫停。李蘭舟的“俄文報譯”也是從第 51 冊開始的）。第 50 冊的“東文報譯”篇幅為六個對開頁，比以前的其它各期都多。可見古城是為離開上海做了準備的，只是不知他是否有再回上海的打算。

通過對上述信函的分析，古城貞吉 1897 年的年初至年底大部分時間在上海逗留似可成定論。^[4]但是，我們有沒有更直接的證據呢？

古城生前收集了中國典籍五萬餘冊，細川家族（古城家鄉九州的豪族，日本原首相細川護謨即該家族後裔）曾經資助古城在家裡修建了一個 60 多平方米的書庫，以收藏這些書籍。古城去世後，其藏圖書匯入細川家的永青文庫。現在，古城的藏書作為“坦堂文庫”寄托於慶應大學的斯道文庫內。筆者曾想如果能在古城的舊藏書中找到他的來往信函，日記手稿等類的記錄文字，便可解開這段迷團。只是由於筆者生性懶惰，一直未能將這個想法付諸實現。

日前，在一次閒談中，同仁陶德民教授，賜教筆者：曾在斯道文庫閱覽過古城的一個手稿，名為《滬上銷夏錄》。陶教授並惠贈當時閱覽《銷夏錄》時所做的書志記錄。這個消息使筆者大喜過望，這正是我要尋找的古城貞吉在上海生活的第一手材料。本手稿現寄存在斯道文庫中，所有權屬於永青文庫，閱覽須得到該文庫的許可。蒙該文庫批准，筆者於初夏某日得到了披覽古城手稿的機會。



《滬上銷夏錄》第一葉上

《滬上銷夏錄》的圖書卡上有“寫〈明治〉自筆”，即明治時期的親筆稿本的意思。索書號為 292-20-1，實測尺寸 12.7×22.8cm，淺黃色封面，封面題簽為：泥橋對秋漫錄 / 滬上銷夏錄（ / 為改行）。內頁為對折薄道林紙，印有粉色方格，9 行×25 格，共 40 葉，其中 21 葉為空葉。中縫下端印有“陳一鶚”3 字。

古城手稿的第一葉第一行書“滬上銷夏錄”，改行退兩字是介紹《銷夏錄》緣起的內容，有云（參見前頁書影）：

余到滬之明年，與人分僦屋於虹口北端，暑熱如燉，想昨夏初來之時，猶似未及焉，沉俗氣滿目，無好友以談心，又不見有佳山水足探幽，俯仰一室之間，一片耿耿之氣。不可抑遏焉，乃呼筆信手書所欲言，一時興到之言，固不足存，然情觸景乃發，意真於言外，則猶優與俗客對談俗事，萬萬矣，作滬上銷夏錄。

這份手稿不具署名，也沒有日期。從“余到滬之明年”“昨夏初來”等文字，我們知道古城是連續兩年在上海過夏天。這在時間上只有 1896 年，1897 年才有可能。因為 1895 年古城自述在朝鮮及中國的遼東半島“浪遊”，而 1898 年夏秋發生了戊戌政變，其時古城在日本，並來信詢問汪康年的安危（參見上文的往來書函時間表）。另外，井上哲次郎證實 1896 年夏天古城從上海來信，請他為古城的著作《支那文學史》寫序（見該序文），可見 1896 年的夏天古城是在上海了。而稿中一些敘述也旁證了《銷夏錄》的“夏”是 1897 年之夏。例如，古城哀嘆“吳鐵樵相見後數旬去世”。吳鐵樵即吳樵，1897 年“應湘撫陳寶箴招，赴湖南協辦礦務，至武昌時染瘟疫，遽卒”（《書札》4043 頁）。兩人相見是 1897 年的事。

在《銷夏錄》中，古城還記錄了與文廷式的交往：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歸故山，途出滬上，余相見於酒間，筆談如山，贈以所撰文學史，廷式有詩云，滄海橫流剩此身，頭銜私喜署天民，豈知零落栖遲地，忽遇嶽崎磊砢人，定論文章千古在，放懷世界一花新，停雲自此長相憶，何處桃源欲問秦，其人磊砢不與時令，頗有不可一世之氣，故姑及此。

文氏路過上海是 1897 年，回鄉之後給汪康年來信說：“滬上淹留至五十日，為平生三十一一次到滬最久之一次，（中略）別有寄古城坦堂詩箋一，示乞轉交為盼。（《書札》，20 頁）”，可以作為旁證。不知古城所錄之詩是否為汪康年轉交之詩箋上的贈詩。

《銷夏錄》的內容，如古城本人所說，“乃呼筆信手書所欲言，一時興到之言”，行文消沉，不時做激憤之語。他還在《銷夏錄》中用了很多筆墨追悼在朝鮮半島陣亡的摯友有次滿象和胞弟古城祐之。古城也提到了與黃遵憲，蔣伯斧，吳德瀟，吳鐵樵，羅叔溫等中國的官員，士子的交往，只是記錄極為簡單。而下面一段則沒有涉及個人交往的情景。

鄭蘇龠孝胥，嘗為駐日本領事，名聲籍甚，張讓三英翊，亦嘗出洋，熟輿地，葉浩吾，翰，葉清漪，皆熟西學書，又有志辦事，張經甫煥綸，何梅孫？氣並名士也，此等為在

此地之名士也

李一琴維格在時務報幹事，英文譯章，徐勤字君勉為知新報主筆，馬良相伯嘗為領事在神戶，並在此地，

許靜山常州無錫之人，前在美英二國數年，其人儒雅老實，亦此土名士矣，

這些人都是汪周圍，或與《時務報》關係較深的人。手稿中還有一些對中國書畫文物的品評。但是古城對他在炎熱的上海居留的目的隻字不談。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對《時務報》的工作，報館的同仁幾不置一詞。^[5] 具體原因不得而知。《銷夏錄》中有一段文字引起筆者的注意：

北京矢野公使發電音至上海領事館，使弟月貲薪水若干，領事唯唯傳命於余，甚哉，人無理也，古者問祿於士，士所恥焉，今也問者優勢，使人不得不答，噫亦甚矣，

矢野公使者，即矢野龍溪，政治家，小說家，漢學造詣極深。1897年3月11日被任命為駐中國公使，同年6月12日到北京，1899年10月11日離任。矢野指示上海領館給古城每月送薪水若干。《時務報》方面的報酬為每月100圓左右，遠遠高出日本當時的工資收入，應該說是不錯的。^[6] 所以，矢野的錢不是單純救濟性質的，而是對古城工作的報酬。無功不受祿，古城或者負有某種使命。這也許是古城對上海一段三緘其口的真正原因。

從他自述的文字看，古城在上海的生活較寂寞，孤單。古城多次提到與某人“筆談如山”，可見他還不能進行口語交流。

《銷夏錄》之後，是“對秋漫錄”。卷頭題名為“泥橋對秋漫錄”。可以看作《銷夏錄》的續篇。僅兩葉餘，主要是就書法作品與中國文人的筆談。

《滬上銷夏錄》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由於閱覽時間的限制，筆者只能匆匆翻檢一遍而已。細節等容他日再做介紹。

注釋

1. 有關議論請參見沈國威“康有為及其《日本書目志》”《或問》第5號2003年51-68頁。
2. 詳細情節參見沈國威等1998年研究成果報告書
3. 關於本信函的年份，村田雄二郎1992的腳注（19）指出“1897年1月24日の汪康年宛て古城貞吉の書簡によれば、このとき日本に一時帰国していた古城は『時務報』館のために各種書籍を購入したり、新聞雑誌の購読を予約していた。”但是在腳注（17）中，村田卻又說“1897年日報社（のちの東京日日新聞社）に入社し、12月に上海に赴任。同地では『時務報』經理汪康年の知遇を得たのが縁で、同紙の「東文報記」欄を担当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ついで北京に移ったが、たまたま義和団事件に遭い、服部宇之吉や狩野直喜らと東交民巷日本公使館での籠城を経験した。1901年に帰国、（下略）”。本論文承鄒振環教授賜教。

4. 其它材料也可以證明古城 1897 年在上海，例如，梁啟超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三月三日給康有為的信中說，請當時在《時務報》館內的古城貞吉代為物色翻譯人員。
5. 古城子女提供資料的傳記中都沒有關於《時務報》的記載。古城本人提交給大學的簡歷中只說曾於甲午戰爭後在上海從吳清秋學漢學。吳清秋傳不詳，疑是在上海過從甚密的吳德瀟（字季清）。
6. 《銷夏錄》中稱之為好友的片山敏彥（字浩然），當時在日本海軍任翻譯官，月薪 50 圓。1898 年夏作為古城的後任曾來上海見汪康年（具有面試的性質），談好來《時務報》工作，月薪 100 圓。後因戊戌政變，未果。

參考文獻

- 沈國威 2003 “康有為及其《日本書目志》”《或問》第 5 號 51-68 頁。
- 社団法人松下国際財団研究助成研究成果報告書「欧化国家を目指せ：情報発信基地としての 19 世紀日本——日本新聞の中国語訳を通して見る近代日中語彙交流」1998，
沈國威，内田慶市，熊月之，王揚宗
- 《時務報》中國近代期刊匯編 中華書局 1991 年影印版
- 《汪康年師友書札》一～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89
- 平田武彦 1954 《坦堂古城貞吉先生》西海時論社
- 村田雄二郎 1992 「康有為と「東学」——『日本書目志』をめぐる」《外國語科研究紀要》
東京大學，第 40 卷第 5 號 1-43 頁
- 閻小波 1995 《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傳播媒介》上海三聯書店
- 蔣英豪編著 2002 《黃遵憲師友記》上海書店出版社版（原香港版 2000 年），48-49 頁
- 丁文江，趙豐田編 1983 《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78 頁
- 《近代稗海》第 12 輯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古城貞吉稿 井上毅先生伝》木鐸社 1995

鳴謝：謹對陶德民教授（關西大學），鄒振環教授（復旦大學）提供的幫助表示衷心謝意；並感謝永青文庫，斯道文庫為本調查提供的方便及書影登載許可。

本稿為下述項目研究成果之一部：

日本學術振興會基盤研究（A）（一般）

中国文化的伝播、変容と還流——中国沿海地域と日本——（代表者：藤田高夫）